



FANPINKUN YU RENKOUWENTI

反贫困 与人口问题

叶明德 刘长茂 著

杭州大学出版社

序

消除贫困是世界性问题。作为著名的“3P”(Population, Poverty, Pollution)问题之一的贫困，虽然从本世纪50年代起已经得到了广泛的重视，联合国等国际组织联合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制定了种种经济发展战略，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物资，试图通过增大“经济饼”来解决贫困问题。但遗憾的是经济增长并没有像人们所希望的那样通过“消涨效应”惠及贫困人口，贫困问题并没有得以缓解，在一些地区反而恶化了。据联合国统计，目前世界上仍有十多亿人口生活在绝对贫困之中。正如前联合国秘书长加利所说，“在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忍受着绝对贫穷、饥饿、疾病的现实面前，在发展问题上没有任何问题比解决这一社会病症的根源和症状更为迫切的了。”^①

消除贫困也是中国当前的迫切任务。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所决定的。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为减少和消除贫困作了艰苦的努力。1994年中国政府又制定了“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力争到本世纪末基本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人类发展史上空前的壮举。祖祖辈辈多少代人的梦想，在今天将要变为现实。贫困地区之所以贫穷，原因很多，渊源久远。然而人口的数量过多、素质偏低、结构不合理，是诸多致贫因素中最值得重视的因素之

^① 见1995年2月27日《人民日报》。

一。为了探求贫困地区人口与脱贫致富之间的内在联系,为贫困地区解决人口与发展问题出谋划策,1990—1994年在联合国人口基金资助下由我牵头设立了“中国23个贫困县人口问题研究”课题,对分布于22个省区的23个贫困县进行了调查研究。5年中我们先后开过5次专题学术讨论会,并组织代表去智利、墨西哥作专题考察,先后写出了针对性很强的咨询报告140篇,出版了《中国贫困地区人口经济国情资料》和《脱贫致富的人口对策》一、二、三集,最后出版了课题最终研究成果《消除贫困的人口对策研究》专集。叶明德、刘长茂是这个课题组的骨干成员。他们开发利用本课题所取得的数据资料,并搜集国内外有关人口与反贫困的最新资料,对贫困地区人口与发展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他们合著的《反贫困与人口问题》,反映了他们自1990年以来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

通读《反贫困与人口问题》一书,我感到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结合、综合研究与个案研究结合、现状研究与对策研究结合是这一专著的特色,也是这一专著的价值所在。

“中国23个贫困县人口问题研究”课题在实施过程中,按县分成23个子课题,各子课题以解剖单个县人口与经济关系为基础展开调查与研究,为县级单位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对于各贫困县之间一些既有共性又有较大差异的问题,虽然举行过多次专题讨论,彼此间深受启发,并为课题总报告的写作奠定了基础,但尚未形成综合研究的专著。《反贫困与人口问题》一书的上篇即综合研究部分,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不足。

在23个定点研究的贫困县中,浙江省磐安县是颇具特色的。这个县重视人口因素在脱贫致富中的作用,在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上下了真功夫。80年代中期以来,该县的人口再生产就进入“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现代类型。据“四普”资料,该县1989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6.86%,总和生育率为1.2,均低于全国和全省平均水平,在世界上也属于最低的一类。1996年1月,磐

安县以 17 项达标、4 项基本达标的良好成绩，顺利通过由山东、四川等 6 省教育专家组成的验收组的评估验收，成为全国最早实现“两基”（基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达标的贫困县。人口状况的改善，特别是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得到有效控制，发挥了良好的“分母效应”。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均收入水平迅速提高，到 1996 年年底就摘掉了“贫困县”帽子。《反贫困与人口问题》一书的下篇，集中解剖繁安县人口现状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揭示人口与脱贫致富之间的内在联系，总结他们综合治理人口问题的经验，这无疑对其他贫困县会有所启示。繁安县持续低生育率状况的出现，把贫困地区现代人口转变的问题提到人口研究的日程上来。这是一个崭新的领域。《反贫困与人口问题》的作者是这一领域的最先涉足者之一。

人们对人口与贫困关系的关注，可以追溯到十分久远的年代。近代以来，新、老马尔萨斯主义者以人口与贫困关系为主题发表过许多论著。然而他们都侧重于对人口的量的分析，并且在他们眼里，不管是马尔萨斯主义的“魔鬼”P（即人口过剩产生贫困），还是马尔萨斯主义的“魔鬼”U（即人口过少导致资本有效需求降低，引起失业），人口都仅仅是一个消极的因素。《反贫困与人口问题》的作者是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探索人口与反贫困之间的关系的。在这里，人口不仅有量的特征，而且是数量、质量、结构与分布的有机统一。人口在反贫困的过程中，固然有时是起阻碍作用的消极因素，但同时又是能起促进作用的积极因素。作者在“结论”中对人口在反贫困中的地位与作用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在第九章中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人口发展观”的概念，这些都令人耳目一新。这对于活跃人口理论研究是有积极意义的。

多年来，中国的人口学者为了探索贫困与人口的内在联系机理，以便把人口从经济发展的阻力变为助力，推动、加速脱贫致富的进程，足迹遍布全国各个贫困地区，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然

而在现实生活中，人口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同时，不同的贫困地区，致贫因素及脱贫途径也不尽一样。在人口与贫困、人口与经济、人口与发展领域，还有许许多多问题等待着人们去深入研究。我们期待着有更多的论著问世。

张纯元
1998年1月于北京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反贫困是全球性的任务	(1)
第二节 中国的反贫困行动	(12)
第三节 人口在反贫困中的地位与作用	(24)
第四节 协调两种生产是告别贫困的必由之路	(35)

上篇 综合研究

第二章 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的分布	(40)
第一节 贫困县的数量及变化	(40)
第二节 省区贫困县分布及变化	(43)
第三节 经济区贫困县分布及变化	(50)
第四节 三大经济带贫困县分布及变化	(54)
第五节 各类地形的贫困县分布及变化	(58)
第六节 特殊地区贫困县分布及变化	(62)
第七节 连片贫困县分布及变化	(68)
第三章 贫困地区的人口增长	(71)
第一节 贫困产生人口	(71)
第二节 贫困地区的生育状况	(76)
第三节 人口过快增长的经济社会后果	(82)
第四节 控制人口数量的对策	(88)
第四章 贫困地区的生育观念	(93)
第一节 生育观念的社会过滤	(93)
第二节 文盲多生,并非越穷越生	(97)

第三节	对策的核心是提高人口文化水平	(103)
第五章	贫困地区的人口素质	(108)
第一节	贫困地区人口身体素质	(109)
第二节	贫困地区人口文化素质	(115)
第三节	贫困地区人口社会心理素质	(130)
第六章	贫困地区的婚姻与家庭	(135)
第一节	贫困地区的婚姻	(135)
第二节	贫困地区的家庭	(144)
第三节	解决贫困地区婚姻与家庭问题的对策	(154)
第七章	贫困地区人口的收入结构与消费结构	(163)
第一节	贫困地区人口收入结构及其特点	(163)
第二节	改善贫困地区人口收入结构的主要措施	(172)
第三节	贫困地区人口消费结构及其特点	(177)
第四节	改善贫困地区人口消费结构的对策建议	(188)
第八章	贫困地区的人口生态	(196)
第一节	贫困地区人口的自然地理特征	(196)
第二节	贫困地区人口生态系统的现状与特点	(204)
第三节	改善人口生态环境的主要措施	(216)
第九章	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的人口对策	(226)
第一节	树立可持续发展的人口发展观	(226)
第二节	抓紧抓好计划生育,继续控制人口数量	(233)
第三节	抓好科教扶贫,促进科教兴农	(237)
第四节	改善人口结构,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239)

下篇 定点研究

第十章	磐安县人口变动趋势与对策	(251)
第一节	磐安县人口变动状况	(252)

第二节	人口变动过程中的问题及对策	(254)
第十一章	磐安县人口素质分析	(257)
第一节	磐安县人口素质的一般状况	(257)
第二节	磐安县人口素质方面存在的问题	(260)
第三节	提高磐安县人口素质的若干建议	(263)
第十二章	磐安县劳动适龄人口就业困境与出路	(268)
第一节	农业剩余劳动力增长的形势	(268)
第二节	农业剩余劳动力向何处去	(270)
第三节	加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基础工作	(276)
第十三章	磐安县育龄人口生育观念的转变	(279)
第一节	生育意愿调查的基本情况	(279)
第二节	对磐安县人们生育观念的基本看法	(284)
第三节	促进人们生育观念转变的措施	(289)
第十四章	磐安县的人口转变及其意义	(292)
第一节	磐安县的现代人口转变	(292)
第二节	磐安县人口转变的原因	(295)
第三节	磐安县人口转变的特点	(300)
第四节	贫困地区人口转变的意义	(303)
第十五章	优化磐安县人口环境的意义及对策	(306)
第一节	当前人口状况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	(306)
第二节	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对策	(312)
附录:P04项目“中国23个贫困县人口问题研究”课题		
磐安县子课题咨询报告	(319)	
主要参考文献	(353)	
后记	(355)	

第一章 絮 论

第一节 反贫困是全球性的任务

一、世界贫困人口状况

1996年1月18日，在联合国总部公共大厅里，竖起了一个两米多高的电子数字显示钟。钟面上的红色数字一分钟增加47个，一天增加6.7万多个，一年增加2400多万个。钟的周围用联合国6种工作语言告诉人们：“时钟上每一个数字代表着又一个人在贫困中诞生”。

在20世纪即将结束之际，虽然人类社会进入了空前发展的时代，人类的才智导致了许多技术的突破，全球的财富在过去的50年中增加了7倍，今天的世界要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富足，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人类文明的高度发展却伴随着与其极不协调的阴影——世界性的贫困。我们仍然生活在一个以饥饿、贫困和日益增加差异为特征的世界上。

贫困，一般说来有狭义贫困和广义贫困、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之分。狭义贫困是指从经济角度来定义的贫困概念，即生活不得温饱、生产难以维持的状态。广义贫困则是从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来定义的贫困概念，它不单指温饱问题，而是指整个生活质量，包括寿命长短、享受社会和人类文明的状况等。绝对贫困是指人们在

消费方面无法得到衣、食、住等人类基本生活需求的满足,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在生产方面也缺乏生产的物质条件,难以维持简单再生产。相对贫困是一个社会道德范畴,属于社会公平领域,它没有一个统一的、具体的标准。当前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也是本书所要着重论述的是狭义贫困和绝对贫困。

要确切反映当今世界的贫困状况是不容易的,一是缺少有关贫困人口的数据,二是现存的经济与社会指标又都不太准确。世界银行曾确定年人均收入在 370 美元以下为世界贫困线,275 美元以下为绝对贫困线。1995 年 3 月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举行的联合国社会发展世界首脑会议的宣言和行动纲领,对这一定义进行了补充和修改,认为绝对贫困指的是一种状况,它不仅取决于收入,而且还取决于能否获得基本的社会服务。

不管是国际社会确定的贫困标准,还是各国自行确定的贫困标准,反映出的数字是令人不安的。据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1997 年 10 月 17 日,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国际消除贫困日”之际发表的文告指出,1987 年至 1993 年,每天生活费不足 1 美元的人口增加了近 1 亿;在发展中国家,目前有 13 亿人每天生活费不足 1 美元;在发达国家,1 亿多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贫困人口大都集中于农村。1981 年联合国粮农组织估计,在整个第三世界的农村,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比从近东的 32%,到亚洲的 49.8%,拉丁美洲的 53.4%,一直到非洲的 65.2%。^①1988 年 4 月 21 日联合国秘书长在联合国经济理事会作《食物与农业,土地改革与农村发展的分析与评论》发言时宣称:无法逃避的结论是根据目前公认的事实,农村贫困人口的生活状况

^① 参见陈宗胜等著:《新发展经济学:回顾与展望》,中国发展出版社,1996 年版,第 225 页。

比 10 年前更糟。^①

目前大多数贫困人口生活在 59 个低收入国家——主要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和南亚地区，这些国家的人口数为 31 亿。但是，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即使在发达国家，消除贫困的努力也远远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作为世界首富的美国，1978 年生活在官方确定的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有 2450 万，占总人口的 11.4%；到 1988 年，进而增加到 3250 万，占总人口的 13.5%；1991 年达到 3570 万，占总人口的 14.2%。^② 据香港《广角镜》月刊 1995 年 1 月号的报道，美国穷人的数量已增至近 5000 万人，相当于美国人口的近五分之一。据路透社 1996 年 1 月 16 日的报道，美国有 2600 万人靠向慈善机构领取食品度日。据美国国会饥饿中心统计，美国有 3000 万人食品不足，处于饥饿状态，其中有 490 万老人。1994 年 5 月，美国政府在其公布的关于无家可归者的“战略计划”里说，据估计，全美无家可归者约有 952 万人。可见，目前世界发展的格局是畸形的，技术的进步、经济的增长并未自动地给所有人带来福音。

二、贫困原因的探求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摆脱了殖民统治的第三世界国家渴求自身的发展，雄心勃勃的发展计划均强调以比人口增长更快的速度增加国民生产总值。在 50 年代和 60 年代，发展计划强调资本积累和以进口替代为基础的工业化，使国民生产总值最大化。由于以美援为主要内容的欧洲发展的成功，人们曾天真地认为亚、非、拉与欧洲一样，都需要发展，也都可以很快发展，认为只要提供了资本，发展了工业，就可以带来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实现发展的目

^① 参见陈宗胜等著：《新发展经济学：回顾与展望》，中国发展出版社，1996 年版，第 225 页及注释。

^② 见 1996 年 5 月 27 日《中国人口报》。

标。到了 70 年代中期,人们失望地发现,尽管在过去 30 年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占国民收入的比例越来越大,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也并不慢,然而失业和就业不足却继续存在,有更多的人处于绝对贫困之中,收入分配更不平等。早先人们所期待的经济增长会通过“涓滴效应”惠及贫困人口的良好愿望并未实现,人们所面对的是“有增长而无发展”的严酷现实。

第三世界国家为什么在二战后长达三四十年的时间内未能像人们所期望的那样得到发展?或者用经济学家们的话说,为什么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三的国家的经济实绩,仍然远远落在现代技术潜力可以达到的最低水平后面?对于这个问题,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以及政治活动家们众说纷纭。

有的强调内部障碍。例如,由西方国家学者提出的“现代化理论”认为,社会发展与现代化的主要动力是来自内部,而发展中国家社会发展不顺利的根本原因是来自内部的障碍。英国的现代化理论家鲍尔就认为,经济能否取得进步和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的能力和态度,取决于根据能力和态度而建立的社会政治制度和采取的组织措施,还取决于历史经验;而外部关系、市场机遇和自然资源等因素是次要的。这种理论直接来源于德国社会学家韦伯的思想遗产。现代化理论家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社会发展障碍时,都特别重视传统文化中的价值观念的作用。他们一般都不赞成从外部、从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方面来考察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障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应有的责任更是讳莫如深。

有的强调外部障碍。具有代表性的是“依附理论”。该理论从方法论上看,明显的特点是反对局部分析和社会内部分析,而提倡世界分析。该理论认为,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并不是处于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而是处于同一阶段,不过一方是处于中心或城市的地位,另一方则是处于卫星或边陲的地位。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使中心与外围之间建立了一种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中心剥削外

围的主要手段就是贸易的比价不合理。发达国家的发达正是发展中国家不发达的根源。依附理论兴起于 60 年代末，衰落于 70 年代中后期。它的思想来源一个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另一个是由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一批学者提出并流行于五六十年代的“发展主义”思潮。与依附理论相类似的是 70 年代中后期兴起的“世界体系论”。该理论也强调要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目前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巨大差距正是这个整体造成的，是发达国家的发达导致了不发达国家的不发达。“世界体系论”与“依附理论”的区别只是在于：(1)前者将世界分为中心、边陲和半边陲三部分，避免了后者的简单两分法的倾向；(2)前者强调依附的双向性，后者所讲的依附是单向的；(3)前者指出世界体系是变动的，后者并未强调动态变化。

有的强调硬件的约束。例如，H·明特曾说：“为什么有些不发达国家比其他的一些不发达国家增长得快些或者慢些？当我们试图答复这一问题时，我们就会非常清楚地了解到，不发达国家在国家大小，在人口对自然资源压力的大小，在世界对它们的出口的需求状况，在它们的一般经济发展水平和政治稳定等方面，都是存在着差异的。这些差异本身，就大大地说明了为什么不同的欠发达国家增长速度不同。”^①

有的强调软件的约束。例如，G·M·迈耶认为，任何一国经济发展的潜在速度，都由四种制约因素的被放松来决定：储蓄、外汇、农业、人力资源。但是经济发展的实际速度由于政策不合适而处于潜在速度之下。“超级制约因素”为管理——对私人的和公共的企业都很重要。必须采取合适的政策动员资源，有效地配置资源，并提高生产率。通过这样做，才能使发展的实际速度经过一段

^① 见陈宗胜等著：《新发展经济学：回顾与展望》，中国发展出版社，1996 年版，第 270 页。

时间以后接近潜在的速度。过去认为，不发达国家之所以穷，就是因为它穷（贫穷的恶性循环）；现在应该说，不发达国家之所以穷，就是因为它的政策不好。^① 劳埃德·雷诺兹认为，“在这个时代，有些国家进步得比别的国家快，而有的国家则根本没有进步。这些差别的解释，似乎主要不在于要素赋有领域。有些国家（地区），天然资源很贫乏，例如韩国和台湾，却成绩卓著；有些资源丰富的国家，例如扎伊尔，却仍然在艰苦挣扎。我的假设是，唯一最重要的可以用作说明的变量，是政治组织和政府行政能力。”^②

解释贫困和不发达原因的代表性论点自然不止这些，总之见仁见智，各有分说。就某一侧面而言各有几分道理，若将它们综合起来看则更能拓宽人们的视野。事实上，贫困并不是由单一的原因造成的，要是那样的话，反贫困的任务就不会那么艰巨，因为单一的障碍总不难找到替代的措施。在当今世界，阻碍不发达国家和地区脱贫致富的，既有来自国际大环境的障碍，又有来自内部的障碍；既有气候、环境、自然资源、人口状况等方面的硬约束，又有政治的、制度的以及文化的软约束。贫困、不发达是特定社会历史背景下的综合症，人类至今尚未能找到也不可能找到医治贫困的单方或偏方，它需要综合治理。

三、摆脱贫困的途径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不发达国家或地区要摆脱贫困，首先必须着眼于内部的变革。在这个问题上，“内源发展”理论是值得重视的。“以人为中心的内源发展”概念是在联合国教科

^① 见陈宗胜等著：《新发展经济学：回顾与展望》，中国发展出版社，1996年版，第269页。

^② 见陈宗胜等著：《新发展经济学：回顾与展望》，中国发展出版社，1996年版，第270页。

文组织的第一个中期计划(1977—1982年)中开始提出的。而在第二个中期计划(1984—1989年)中被列为向发展中国家广泛推行的发展模式。“内源发展”理论的基本观点强调了以下几点：

1. 强调发展的内源性,即“起源于内部的发展”(development from within)。它的倡导者把“自我中心的发展”、“自我指导的发展”、“自立过程”作为内源发展的同义词。
2. 强调“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或“人是发展的中心”。包括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指发展是为了满足居民的实际需要——包括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道德的、精神的需要;另一方面指人民必须参与决策和发展的进程。
3. 强调发展内容的整体性和协调性,即既包括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的协调发展,又包括社会一切领域相互间的协调发展。
4. 强调“人民的文化本性”和传统的价值标准在发展中的地位,主张依靠本国土生土长的能力去解决一个国家自己的问题。
5. 强调发展模式的多样性。它的倡导者认为,以人为中心的内源发展模式不是强加于任何国家的无个性特征的模式,而是一个独立和自主的过程。“内源发展模式”实际上包含无限个各有特色的发展模式。
6. 强调发展的实验性。把发展看作一个持续不断的修正过程。

毫无疑问,“内源发展”理论的提出,标志着发展中国家发展战略的重大调整。它不再以西方发达国家作为追赶的战略目标,强调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避免对发达国家在经济上、文化上的严重依赖。它不再以单纯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作为追求目标,而强调社会的全面发展和协调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它着眼于本国民众,发展的目的是为了民众,发展的动力也源于民众,即要求民众参与决策和发展进程。1992年下半年,“中国23个贫困县人口问题研究”课题组部分成员曾在联合国人口基金的帮助下,组团到拉丁美

洲考察那儿的反贫困情况。在墨西哥考察时,无论在城市贫民区还是在乡村印第安人居住区,笔者都亲眼见到那儿的平民百姓热情主动地参与扶贫项目活动。政府的扶贫机构也十分重视普通百姓的主动参与,并尊重群众自己的组织形式。可见,“内源发展”理论的一些基本精神在那里已经得到响应,并产生了一些好的效果。

然而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内源发展模式要在所有发展中国家推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发展生产力,必须首先解放生产力。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社会和经济的分层严重地阻碍着处于底层的贫民对发展的参与。既然内源发展要以人为中心,“发展是人的各个方面的发展和一切人的发展”,那么发展的首要问题自然是要向营养不良、疾病、文盲、贫民窟、失业和不平等等祸害发起进攻。然而在一些国家的农村中,就业不足、营养不良的贫民,有的完全没有耕地,有的只有少量的耕地。他们或者以昂贵的租金租种地主的土地,或者成为农场主的雇工或季节工,或者流入城市加入城市贫民的队伍。虽然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曾以激进的革命口号提出过,久而久之似乎逐渐被人遗忘。事实上无论在南亚还是在拉美,许多国家都仍然存在土地改革的问题。要是土地与资源的所有权及使用权问题不解决,那么一系列的发展措施都难以推行,即使有所发展,其成果也注定要被极不公平地分配,贫弱的阶层只能获得最小的部分,或者什么也得不到,甚至成为发展的牺牲品。

经济上的不平等会导致政治上的动荡,这是必然的现象。据报载,厄瓜多尔由于经济问题严重,财富分配不均,土地问题、印第安人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60%的人口处于贫困之中,文盲率高达30%以上,导致政局不稳。布卡拉姆总统上台只半年时间就被国民议会罢免,议长阿拉尔孔随即宣誓出任临时总统。布卡拉姆认为他是民选总统,国民议会罢免他实际上是一次政变,因而拒绝交出总统权力。副总统阿特亚加则认为,在总统被罢免的情况下,副总统

担任临时总统是有法律依据的,于是也宣称自己是临时总统,结果出现了一国三君的混乱局面。^①经济发展需要安定的社会环境。第三世界一些国家政局的动荡自然要影响经济发展。由动乱到安定需要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也许是难以避免的。因此,这个过程与其说是发展的障碍,还不如说是变革中的阵痛。

唯物辩证法在强调内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据的同时,并不否认外因的作用,而认为外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条件。第三世界国家的贫困与不发达,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受不平等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制约。就其根源而言,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别是殖民制度的必然结果。这就是当今的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无法重复发达国家的发展过程的根源所在。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区别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它具有国际的性质。资产阶级社会的真实任务是建立世界市场和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正是通过开拓世界市场,资产阶级创造了以国际分工为基础的商品生产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这是一个“中心卫星”式的经济体系。工业化国家是“中心”,是“世界工厂”;从事农业生产的国家是“卫星”,是工业国的产品销售市场和粮食及原料的供给地。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中曾形象地指出:“英国是农业世界的伟大的工业中心,是工业太阳,日益增多的生产谷物和棉花的卫星都围着它运转。”^②

殖民主义以特殊的方式和手段加强市场的力量。宗主国不仅保护附属国作为自己工业产品的市场,而且保护国内市场不受来自殖民地的竞争,并以尽可能低的价格获得来自殖民地的初级产品。如今殖民主义已经声名狼藉,随着非洲最后一个殖民地纳米比

① 见1997年2月9日《人民日报》。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9页。